

# 跳出《周易》看《周易》

## ——“数字卦”的再认识

· 李 零 ·

在中国古代的占卜中,卜筮是自成一类。卜用龟(或骨)而筮用策(或著),这是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中国方术考》中,我曾专门讨论过这个类别,指出卜、筮在商周时期地位很高,二者本来是结合在一起;卜衰筮显,分道扬镳,只剩“三易”中的《周易》广为人知,那是汉代和汉代以后的局面。它和《周易》作为儒籍地位不断提高有关。当时,为了勾画古代筮占的总体轮廓,我曾强调,在《周易》之前,还有一个“前《周易》”的发展时期;《周易》之外,也有《连山》和《归藏》,古代筮占绝不止《周易》一种。这些都是受考古发现启发。<sup>①</sup>

考古发现对我们既有知识的突破,主要是现在已为大家熟知,流行于商代到战国,见于多种书写材料,用数字符号表示的“数字卦”。这样的“数字卦”,过去有不少学者做过搜集,彼此略有出入,释读和理解也有一些差异,但大家对这类符号的性质却有高度一致的看法。大家都认为它是一种与《周易》类似的卦画。<sup>②</sup>

现在我们能够认识“数字卦”,这有一个过程。李学勤先生和唐兰先生都有贡献,但功劳最大还得属张政烺先生。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学界对“数字卦”达成共识,几乎所有研究都是追随张先生。<sup>③</sup>回顾以往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学者破译“数字卦”,《周易》是突破口。<sup>④</sup>例如早在1956年,李学勤先生就已猜测西周甲骨上的这类符号似与《周易》的九、六之数有关;<sup>⑤</sup>而1978年,张政烺先生对这类符号做全面论述,出发点也是“文王演周易”。<sup>⑥</sup>由于大家的思路老是围着《周易》转,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往往都把出土发现的“数字卦”直接转写为《周易》的卦画。例如张政烺先生就是把出土“数字卦”化简,一、五、七归为阳爻,六、八归为阴爻(当时尚未发现数字九),按《周易》转写,列为表格,分别注明其对应的“经卦”和“别卦”(如“数字卦”六八一五一,“经卦”为乾下震上,“别卦”为大壮);<sup>⑦</sup>李学勤先生考证中方鼎,也是把铭末所缀的重卦“七八六六六六”和“八七六六六六”理解为坤下艮上的剥卦和坤下坎上的比卦,并按《左》、《国》筮例定为“遇剥之比”。<sup>⑧</sup>

· 李 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这篇短文中,我想讨论的是,学界认为与《周易》类似的“数字卦”,它们和《周易》到底是什么关系?或者也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即它们是不是就是早期的《周易》?如果不是,有没有可能是《连山》或《归藏》?或者就连《连山》和《归藏》也不是,而是“三易”以前或以外的筮占?

我想,对上面这些问题,现在还不可能有最后的结论,但从近几年的考古发现看,有不少线索已经表明,大家把所有“数字卦”都归入《周易》的范畴是不大合适的,整个思路还有待拓广。

下面先讲材料。

## 二

上面所说的“近几年的考古发现”主要是指《中国方术考》出版后又发表的新材料。<sup>⑨</sup>

在《中国方术考》中,我对截止1993年已经发表的“数字卦”进行搜集,经过核实,共得九十四例。通过对这些实例的研究,我的印象是:第一,现已发表的“数字卦”尚未发现早于商代晚期的实例,过去学者引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例子(如江苏海安青墩遗址所出和辛店陶器上的纹饰),其实都并不可靠;第二,这些“数字卦”是以刻铸于甲骨和铜器为最多,其次是陶、石、玉、骨和竹简等物,甲骨刻卦似与卜筮并用有关,而铜器上的卦则可能是用来为铸器择日,可见施用甚广;第三,其用数包括一、五、六、七、八、九,过去学者以为商数用八,周数用九,就发现实例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小屯南地卜甲上有“九”,齐家卜骨上的“九”实为“八”),<sup>⑩</sup>所缺者唯二、三、四(因竖写会发生混淆而省去)和十;第四,现已发表的“数字卦”,年代较晚的实例是见于战国楚占卜简(发表者仅限于天星观楚简和包山楚简),其卦画包括一、六、七、八、九,除未发现五,和商代西周的实例基本上是一样的;第

五,现已发现的《周易》古本有马王堆帛书本和双古堆竹简本,两种都是西汉早期的写本,其卦画阳爻作“一”,阴爻作“八”,<sup>⑪</sup>年代更晚于上述材料。

对重新检验上述认识,近年来有三大发现很值得注意:

(一)商周“数字卦”中数字“十”的发现。

1993年后,又有一些新的“数字卦”被发现,其中尤以曹定云先生揭示的四例最重要。<sup>⑫</sup>它们是:

(1) 1973年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的卜骨(《小屯南地甲骨》4352,中华书局1980年),铭文作“十六五”(倒书)。

(2) 1969—1977年河南安阳殷墟西区墓葬出土的铜爵(M354:2)。铭文作“五五五”。

(3) 1955—1957年陕西长安沣西西周遗址出土的陶纺轮(T105:4:12)。铭文作“六六五六六八”。

(4) 1977年,陕西岐山凤雏村甲组宫殿基址出土的卜甲(H11:235)。铭文作“六六十”。

这四个例子,前两例属于商代,后两例属于西周,其中属于商代的例(1)和属于西周的例(4)都有数字“十”,这是重要发现。它说明无论商代还是西周,其“数字卦”都是省去二、三、四的“十位数字卦”,学者以统计方法总结的用数规律,现在看来应重新考虑。

(二)战国楚简《周易》的发现。

近年来,有一批楚简自大陆(估计是湖北荆门)盗掘出土,流失海外,被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这批楚简,年代可能与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相近,即大约在战国中期。<sup>⑬</sup>现在这批竹简仍在整理之中,尚未公开发表,但个别实物在今年全面开馆的上海博物馆的中国历代书法馆中已先期展出,其中包含竹书《周易》“豫”、“大畜”两卦每

卦的第一简。另外,此书尚有部分残简流落香港,如最近饶宗颐先生披露的一枚残简,就是属于《周易》的“睽”卦,同上博楚简《周易》为同书。<sup>⑭</sup>

这三条简文虽非全帙,但仍可借以窥见楚简《周易》的大致面貌。我们的印象是:

(1) 简文只有经文,即卦形、卦名和卦爻辞,不包括传文;

(2) 简文的卦形是以“一”表示阳爻,“八”表示阴爻,形式完全同于马王堆帛书本和双古堆竹简本的《周易》;

(3) 简文分卦书写,以不同的章句符号相区别,自为起迄,内容与今本大同小异,所不同者只是个别文字,而且多半都是属于文字假读方面的差异。

它说明《周易》一书至少在战国中期就已定型,具有和今本相似的面貌。《周易》的卦爻从战国到西汉一脉相承,都是采取“一”、“八”字样,这对探讨今本《周易》卦爻的来源很有帮助。关于今本《周易》卦爻的来源,过去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的原形是数字,前身是上面说的“数字卦”(张政烺先生和多数学者的看法);<sup>⑮</sup>一种认为它的原形和今本一样,阴爻作八分式样,乃是因为竹简或帛书行栏狭窄,如作中间断开的直线,易于模糊混淆,从而有所变通,和数字恐无联系(金景芳先生和李学勤先生的看法)。<sup>⑯</sup>就现已发现的材料看,我们更倾向于前一种看法。因为第一,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早于古本《周易》(战国一种,西汉两种)而与今本卦爻相似的材料;第二,与这些古本年代相近的简本《归藏》(详下),其阳爻作“一”,阴爻作“六”或“八”,形式也非常相似;第三,这样理解也便于和早期的“数字卦”相互衔接。

(三) 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发现。

1993年,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湖北江陵王家台发掘了十五座秦墓,其中的王家台15号

秦墓,共出土竹简800余枚,包括《效律》、《日书》、《易占》和讲邦国灾异的一种。<sup>⑰</sup>据简报介绍,此墓与江陵地区历年发掘的大部分秦墓相似,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的年代),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元年)。简文抄写年代大约在战国晚期。其中的《易占》共包括五十余卦,卦名有“同人”、“旅”、“兑”、“师”、“丽(离)”、“臣(颐)”、“夬”、“节”等(原文40页所说“人”卦是“同人”之误),卦画是以“一”表示阳爻,“六”、“八”表示阴爻(二者似是混用)。简报发表释文三简(简213、198、182),照片两简(简号未发表,据下王、李二文为“劳”和“大过”两卦),未讨论其性质。现在经学者研究,此书实即“三易”中的《归藏》。其有关论著有:

(1) 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收入古方等编《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10月,101—112页)。此文以古书引用《归藏》(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马国翰《玉房山房辑佚书》等所收辑本)与王家台秦简《易占》比较,指出简文应即《归藏》。作者是王家台秦简《归藏》的整理者,此文共发表简文二十四条(简194、213、536、470、339、336、333、304、550、196、482、491、560、215、473、455、259、204、538、471、563,以及漏印简号的三枚残简),包括简报释文中的简213、198(此文作简194,疑简报有误),以及照片中属于“劳”卦的一简(此文作简536),但没有提到简报释文中的另一简(简182)和照片中属于“大过”卦的另一简(简号不详),增加卦名“明夷”、“劳”、“晋(晋)”、“丰”、“夜(盍)”、“复”、“毋亡(妄)”、“比”,<sup>⑱</sup>使我们对简文的了解又增进了一步。但可惜的是文章印刷不够理想,很多卦画都看不清楚,有些甚至漏印。

(2) 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4期,66—68页)。此文

与上文发表时间相近(从见书时间看要早于前者),论点论据大体相同。其所用简文仅限于简报发表的三简。

(3) 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1期,46—52页)。此文发表稍晚,论点论据亦大体相同。其所用简文仅限于简报发表的五简(作者所说与“比”卦相当的“闭”卦,从照片看,卦名笔画不清,卦画似作“六一六六一六”或“六一六六一八”,相当《归藏》“萃”卦,王文所揭释文作“劳”卦,释“闭”恐误)。

这三篇文章都是以前人所辑《归藏》佚文论定王家台秦简《易占》就是战国晚期的《归藏》,从而证明前人的疑伪之说(主要是以著录的存佚有无和时间先后为说)实不可信。这不仅对我们重新认识《归藏》本身很重要,而且对进一步考虑整个“三易”以及“三易”以前或以外的筮占也很有意义。

### 三

上面提到的考古发现,其意义何在?在众多学者精彩研究的基础上,我想讲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 今本《周易》是东汉魏晋以来整理定型的本子,它同马王堆和双古堆出土的西汉写本的《周易》相比,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写本的《周易》相比,当然会有一些字句差异(主要是文字通假和个别字的出入),卦序排列有时也不太一样(如与马王堆帛书本不同)。但从大的方面讲,我们不应夸大其差异。因为从卦形、卦名和卦爻辞的内容讲,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在总体特征上还是比较接近。这也就是说,至少从战国到西汉早期,其形式相对稳定,很明显是一种连续的发展,在当时的筮占中乃自成一类。这种类型的筮占,它是用“一”、“八”二字来表示卦形,显然不同于商周时期流行的“十位数字卦”,文字内容

同下面所说的《连山》、《归藏》也有区别。

(二) 古代筮占形式多样,在《周易》流行的时间范围里,《周易》与《连山》、《归藏》曾长期并存,合称“三易”,“三易并占”确为制度。如《周礼·春官·大卜》说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书·洪范》说“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占”,贾公彦疏说“盖筮时《连山》、《归藏》、《周易》并用”;《礼记·礼运》引孔子说有《坤乾》、《夏时》之说,郑玄注以《坤乾》为《归藏》;还有《左传》、《国语》所见筮例,除属于《周易》系统的例子,尚有所谓“艮之八”(《国语·晋语》)、“泰之八”(《左传》襄公九年),以及“得《屯》悔《豫》,皆八也”(《国语·晋语》)等说法,据《左传》襄公九年杜预注,这些筮例都是属于《连山》或《归藏》的系统。但《连山》、《归藏》,班志不载,<sup>①9</sup>或云汉初已亡,东汉魏晋反而出现(如桓谭《新论》、《晋中经簿》和隋唐史志所载),且有伪本续作,<sup>②0</sup>令人滋疑。现在《归藏》佚文的可靠性已由王家台秦简的发现得到澄清,《连山》疑伪,情况类似,恐怕也应重新考虑。

(三) 现存《连山》佚文,数量较少,有些佚文的归属也有争议,但魏晋以降,古人引用,不能完全抹杀,如《帝王世纪》引《连山易》“禹娶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启”,《水经注》卷二二《颍水注》“(颍水)东南历大陵西,连山亦(易)曰‘启筮亭’,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钧台也”,卷三〇《淮水注》“故《连山易》曰: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是也”,《史记·夏本纪》索隐引《连山易》“鲧封于崇”,等等。这类佚文中的有些条,如《水经注》卷二二引,或以为《归藏》,或以为《连山》,或以为《连山》、《归藏》共有,尚有争议,但不能说所有佚文都是伪造。<sup>②1</sup>从现存佚文看,《连山》同《归藏》比较接近,而与《周易》的区别稍微大一点。例如:

(1) 《连山》的卦名虽不可考,但繇辞与

《归藏》相像,同样是依托传说的帝王和圣贤;

(2) 据《左传》襄公九年“遇艮之八”杜预注和孔颖达疏,《连山》、《归藏》都是用七八,以不变为占,这和《周易》用九六,以变为占是不太一样的;

(3) 《连山》、《归藏》的卦序与《周易》也不一样,例如《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周易》首乾,就是差别。<sup>②</sup>

(四)《连山》、《归藏》,从简文和古书佚文看,其繇辞多依托古代传说人物,有女娲、夸父、黄帝、炎帝、蚩尤、共工、羲和、后羿、嫦娥、舜、皋陶、鲧、禹、启、桀,以及殷王、巫咸、耆老、周武王、周穆王等等。战国秦汉多称二书为夏、商之易或羲(伏羲)、黄(黄帝)之易,也许就是根据繇辞的内容,但其实际年代还有待研究(古代数术之书有不断改写的习惯,准确点无异刻舟求剑,我们只能求其大致的时间范围)。例如现在发现的王家台秦简《归藏》和前人所辑《归藏》佚文,其繇辞提到周武王和周穆王,当然不会是商代的内容。我们怀疑,所谓“三易并占”,很可能是以年代、国别不同的筮占系统合并为一,它们在共时关系里还是比较接近,在占法上有许多可以相互沟通的地方。例如:

(1) 据《大卜》篇文,《连山》、《归藏》、《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三者在卦数上是一致的;

(2) 《连山》卦名虽无可考,但《归藏》六十四卦,经学者比较,除去异体、通假和加字等差异,真正不同者只占一小部分;<sup>③</sup>

(3) 《连山》、《归藏》用“七八”,《周易》用“九六”,虽有不同,但都没有超出“七八九六”的范围,它们似乎都是以“大衍之数”或类似于“大衍之数”的策数和分组方法为基础。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注意的,“三易”与“三易”以外的其他占卜可能也有某种关系。例如李学勤先生就已指出,《周礼·春官·大

卜》讲卜、筮、梦,卜有“三兆”,筮有“三易”,梦有“三梦”,彼此可能有对应关系。<sup>④</sup>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左传》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卜筮并用的例子,其中有些卜辞与《连山》、《归藏》相似,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晋国卜偃卜纳襄王,其卜辞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对比《归藏》佚文“昔黄帝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太平御览》卷九七引),就是类似的辞例。也许以传说人物为占,正是早期占卜的重要特征。

(五)现已发现的“数字卦”,商代西周似乎是以十数为占者为主体。战国时期,这种“十位数字卦”仍在(见于楚占卜简),但与同时的“三易”似有所区别。这个时期的《连山》尚未发现,但估计是与《归藏》、《周易》比较接近。王家台秦简《归藏》以“一”为阳爻,“六”、“八”为阴爻,上海博物馆藏《周易》以“一”为阳爻,“八”为阴爻,当然有可能是从“十位数字卦”简化,即前者有可能是“三易”或“三易”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的前身。但前者的延续(可以晚到西汉,见上注<sup>⑤</sup>)可与后者共时,而形式有别,应慎重对待。我们不能简单说在“十位数字卦”中,“一”与“五”、“七”、“九”无别,“六”、“八”也是一样(否则何必还要不惮烦地把这么多的数字全都写出来呢)。况且按通常理解的“大衍之数”,我们也不可能得到“十位数字卦”。所以,就目前能够掌握的材料而言,我们认为,最好还是按直观特征把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十位数字卦”(是否可以称“易”还有待证明),一类是“两位数字卦”(“三易”)。后一类又分两小类(《连山》、《归藏》为一类,《周易》为一类)或三小类(《连山》、《归藏》、《周易》各为一类)。

在前辈学者的研究中,对《周易》适用性的怀疑其实早就存在。例如张政烺先生就已坦承,由于从一到八数字太多,他对周初筮法

的拟测,“顾此失彼,无法弥缝”,根本算不上复原。<sup>⑤</sup>李学勤先生也说出土发现的数字卦“使用数字不限于七、八、九、六,便是有异于《左》、《国》筮例的明证,因此,在商周遗物上出现的数字符号,虽然看来是与《易》卦有关,可是属于《易》的哪一种,还是需要论证的问题”。<sup>⑥</sup>

我们对“数字卦”的再次讨论可以说是对这些怀疑的进一步论证。

1997年9月22日写于北京蓟门里

① 李零《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59—62,235—280页。

② 见《中国方术考》235—241页引用的各家说法。

③ 见《中国方术考》235—241页对这一研究过程的描述。

④ 见《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收入《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1—8页)所记张政烺先生的发言。

⑤ 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1期,16—17页。

⑥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4期,403—416页。

⑦ 同上。

⑧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153—160页。

⑨ 《中国方术考》出版后,笔者又见到一些新材料和新著作。参看曹定云《新发现的殷周“易卦”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94年1期,46—51页),徐锡台《淳化出土西周陶罐刻划奇偶图形画研讨》(同上,52—56页)。又注⑥引张政烺文补记提到四十年代四川理县板岩墓出土双耳罐右耳上有卦画作“一八七一八九”,拙作失收,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73—178页论之,定为西汉前期之物,认为卦画的第一个“一”字也可能是“九”字。这是现知年代最晚的“十位数字卦”,应当补入。

⑩ 张政烺《帛书六十四卦跋》(《文物》1984年3期,9—14页)曾有此说,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67—168页把淳化出土西周筮数陶罐上的“八”字

解释为“九”就是受此说影响。笔者在《中国方术考》241页已指出商代甲骨有“九”字,张先生所释齐家卜骨上的“九”字乃是“八”字,其中部斜笔乃骨面裂纹或羨画。案:河南三门峡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筮数陶罐,惜尚未发表。

⑪ 学者曾把“八”误释为“六”,参看《中国方术考》242页。

⑫ 见注⑨引曹定云文。

⑬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7期,35—48页。简报把郭店楚墓的年代定在战国中期的晚段,即约公元前350—前300年左右。

⑭ 饶宗颐《在开拓中的训诂学——从楚简易经谈到新编〈经典释文〉的建议》,《第一届国际训诂学研讨会论文集》,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1997年,1—5页。

⑮ 见注⑩引张政烺文。

⑯ 金景芳《学易四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196页;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215页。又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2期,155—163转154页)举商末周初铜器和战国玺印铭文中类似《太玄经》的“几何直线符号”为说,认为这些符号与八卦同源不同流,是年代最早的卦画。

⑰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1期,37—43页。

⑱ 饶宗颐《殷代易卦及有关占卜诸问题》(《文史》第20辑,中华书局1983年,1—13页)所附《周易》、《归藏》对照表是以《周易》“蛊”卦相当《归藏》“蜀”卦,《周易》“姤”卦相当《归藏》“夜”卦,其实从这几个字的古音看,二者的关系正好应当倒过来,王明钦文以“夜”卦相当“蛊”卦是正确的。

⑲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虽无《连山》、《归藏》之名,但仅凭书名,不能断定必无其书,且《数术略》筮龟类有《大筮衍义》二十八卷和《大次杂易》三十卷,亦属谈易之书,或收之。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尝言“故就史志以考古书之真伪完阙,虽为不易之法,然得之者固十之七八,失之者亦不免二三”(3页),指出历代史志于当时之书多有阙漏不收,佚而复出乃寻常之事。

⑳ 《连山》、《归藏》的西汉传本,史无明文,不

能具论,但桓谭《新论》有所谓“《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之说,皇甫谧《帝王世纪》、酈道元《水经注》等书俱引之,则东汉魏晋南北朝,二书固存于世。前书,或者亡佚略早,《隋书·经籍志·经部》易类只有《归藏》没有《连山》,《子部》五行类有梁元帝《连山》三十卷,疑为续作,又《北史·刘炫传》有刘炫本《连山》,《郡斋读书志》有《三坟》本《连山》,学者断为伪作。后书,《隋书·经籍志·经部》易类有晋太尉参军薛贞注本,共十三卷,小序说“《归藏》汉初已亡,案《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所谓“汉初已亡”,以桓谭所见,可知纯属推测;“圣人之旨”,也是以《周易》为准,太多偏见,现在看来,并不可信。

⑲ 古书真伪存佚往往有疑似之间虽离娄之明不能决者,故前人辑佚多取宽式,效史迁心法,信以

传信,疑以传疑。昔容庚先生尝言:“以伪为真,去之尚易,以真为伪,补之则难,故于诸器非灼知其伪者辄为收入”(《秦汉金文录》序,北平1931年)。李家浩文为排除王家台秦简《归藏》有可能是《连山》,对《连山》佚文只挑存在争议者(两条)为说,摒其余不论,是值得商榷的。

⑳ 见《周礼·春官·大卜》贾公彦疏。

㉑ 参看注⑱引饶宗颐文所附《周易》、《归藏》对照表。案:饶先生以“荧惑”、“耆老”、“大明”为卦名,相当《周易》的“贲”、“大壮”、“中孚”,王明钦文和李家浩文已根据王家台秦简《归藏》,指出它们都是繇辞中的人物或辞语,并非卦名。

㉒ 见《周易经传溯源》28—42页。

㉓ 见注⑥引张政烺文。

㉔ 见《周易经传溯源》154页。